


未名湖畔大师谈

下

访谈

主 编 陈永利

马 戎
杜小真
葛兆光
吴晓东
李 强
黄克剑
汪丁丁
陈平原
蔡仁厚
肖开愚
戴锦华
费孝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未名湖畔大师谈

下

访谈

主 编 陈永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未名湖畔大师谈·下·访谈 / 陈永利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300-24032-9

I. ①未… II. ①北… III. ①人文科学-文集②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1834 号

未名湖畔大师谈 (下·访谈)

主编 陈永利

Weiminghupan Dashit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0mm×23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25.75 插页 2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4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 委 会

顾 问：叶静漪

主 编：陈永利

副 主 编：王逸鸣

执行主编：石运佳 赵 优

编 委：韩 蒙 钟 诚 王 巍 李诗鸿

余 祺 程 熙 冯鹤昌 向 伟

范星盛 高 薇 唐元超 邹昀瑾

黄承炳 齐浩楠 杜宇峰

目录

人类学与文化沟通	
——访费孝通等五位东亚人类学家	/ 1
电影史的文化和精神反思及其他	
——访戴锦华女士	/ 21
个人写作，但是在个人与世界之间	
——访肖开愚先生	/ 49
返本续慧命	
——访蔡仁厚先生	/ 68
学术史·学术转型·北京大学	
——访陈平原教授	/ 76
在哲学和经济学之间	
——访汪丁丁先生	/ 84
价值形而上学·儒学·新儒学	
——访黄克剑先生	/ 103
自由主义与中国政治	
——访李强先生	/ 114
海外与中国	
——访刘东先生	/ 128

探寻文学的诗性之灯	
——访吴晓东教授	/ 141
重写思想史	
——访葛兆光先生	/ 172
知识分子与中国镜像	
——访王岳川先生	/ 186
“因果现实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研究	
——访丹尼尔·利特尔（Daniel Little）教授	/ 196
回归语言	
——访董强先生	/ 211
坚守文学性	
——访曹文轩教授	/ 233
法人类学的解释与延伸	
——访朱晓阳先生	/ 259
迫力下的社会科学需要诙谐	
——访王铭铭教授	/ 274
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访杜小真教授	/ 297
读书与研究	/ 309

- 经典阅读与生命关怀
——访杜维明教授 / 332
- 传统文化的误读与重建
——访楼宇烈教授 / 341
- 从实求知与民族情怀
——访马戎教授 / 356
-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访储槐植教授 / 372
- 在学术与生活，博雅与专精之间
——访吴飞教授 / 394

人类学与文化沟通

——访费孝通等五位东亚人类学家

[学者简介]

费孝通，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1944年加入民盟，1982年当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出版有《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

中根千枝 (Nakane Chie)，1926年生。著名人类学家、藏学家。1951年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毕业。现任国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西藏、印度和日本的社会结构及亚洲社会的比较研究。代表作有《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讲谈社，1967年)，《家庭的结构——社会人类学的分析》(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未开的脸 文明的脸》(中央公论社，1970年)，《韩国农村的家族与祭仪》(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适应的条件》(讲谈社，1979年)，《纵式社会的力学》(讲谈社，1978年)等。

李亦园，祖籍福建泉州，1931年生。就读于台湾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1948年赴台，从事人类学研究至今。曾任台湾大学教

授、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李亦园先生研究范围极广，涉及人类学、文化学、比较宗教学、家庭宗族研究、神话研究，并以台湾高山族、华侨社会以及华南、台湾汉族民间文化为田野研究对象。著有《人类的视野》《文化的图像》《文化与行为》《信仰与文化》等专著 16 种，专业论文一百三十余篇。

乔健，祖籍山西介休。1935 年出生，美籍华人，著名人类学家。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学士（1958 年），考古人类学研究所硕士（1961 年）及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哲学博士（1969 年）。长期任教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东华大学。撰写及编辑有专书三十余种，包括《拿瓦侯传统的延续》《漂泊中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台湾远流版）、《山西乐户研究》（与刘贯文、李天生合著）、《中国的族群关系与族群》（与 Nicholas Tapp 合编）、《大澳渔民家庭的神祇》等。学术论文主要有：《文化变迁的基本形式：以卑南族吕家社百年经验为例》《瑶族及瑶族研究近况》《妇女与宗教：大作村的例》《传统中国的底边社会管窥》《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与文化咨询》等近百篇。

金光亿，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人类学终身教授，国际著名人类学家，研究涉及当代中国和韩国本土研究。曾在韩国发起成立“当代中国研究会”并出任首任会长、创建“首尔国立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先后担任首尔国立大学跨文化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及韩国文化人类学学会主席。

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问：您在四年前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现在请您再把这 16 个字的由来和含义解说一下。

答：1990 年 12 月，中根千枝教授和乔健教授以祝贺我 80 寿辰的名义，在东京召开“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给我出了“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这个题目，要我作一次发言。当时，我读完 Sir Edmund Leach (E. 利奇) 写的 *Social Anthropology* (《社会人类学》，1982)，很受启发。Edmund 是我在伦敦上学时的老同学。问题就是从我们两人的分歧引发的。

他在这本学术自述式的书里表达的关于人类学的看法，与我的很不相同。他认为，“社会人类学并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应当以此为目的。如果说它是什么，其实不过是艺术的一种形式”。他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在西方人类学门内至少有一些学者将它作为表演才华的舞台，或者更平易一些，是一种智力的操练或游戏，或竟是生活中的消遣。我本人对这些动机并无反感。在一个生活富裕，又是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当个人谋生之道和社会地位已经有了保证之后，以人类学来消磨时间或表现才能，确不失为一种悠悠自得的人生。可惜的是，我没有条件这样来对待这门科学，事实上也走不上这条路，即使走上了，也不会觉得愉快。

个人的价值判断离不开他所属的文化和时代。我并不明白为什么 Edmund 放弃他成为一个工程师的前程而闯入人类学这个园

地。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人类学，入学的动机可能是我们两人同在一个学术领域里分道扬镳的根源。我是出生于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正是生逢社会剧变、国家危急之际。从我的价值判断出发，我之所以弃医去学人类学，是因为我自觉地认识到“为万民造福”比“为个人治病”更有意义。我学人类学是想学习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我自己的经验也使我更加确信，人类学是可以成为一门实用的科学的。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可以总结为两条：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想不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对我这一代人还有这样的影响。务实精神潜移默化，渗入学术领域，使像我这样的人，形成了以了解中国、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这并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创见，很可能是历史传统和当代形势结合的产物。

我认为我和 Edmund 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出于我们并不都是英国人或中国人，我们各自的文化传统带来了“偏见”，更正确些应该说是“成见”，这些“成见”有其文化根源。对一个有人类学修养的人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这里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属于不同传统和处境的问题。我们不仅能相互容忍，而且能相互赞赏，我们不妨各美其美，还可以美人之美。这是人类学学者应有的共识。

问：这一共识是否也适用于人类学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的情况？

答：是的。Edmund 在这本书里评论了其中有我一份的中国几个人类学者的著作，提出两个问题：

1. 像中国人类学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

可取？

2. 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

Edmund 对这两个问题都抱着否定的态度。以第一个问题说，他尽管承认人类学学者不妨研究自己的社会，但认为这种样式的实地研究，对没有经验者是不足取的例证。他的主要用意是想指出，一个人类学学者要从自己习以为常的社会中超脱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因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质量。这点我是同意的。怎样才能将自己一分为二、自己观察自己？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多看到一些和自己社会不同的社会。其实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在调查家乡的农村之前我曾在广西大瑶山调查过瑶族的体质和社会组织。我能观察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也许是得益于大瑶山里的一段经历。

当然，只是参与别的社会并不一定能超脱自己的社会，能看别人不一定能看自己。用自己社会的标准去衡量别的社会的人就是如此。我是不大相信一个不能“美人之美”的人能成为人类学者的；而凡是能“美人之美”的人，他不仅能研究自己的社会，也可以研究别人的社会。对他来说并不发生研究对象是自己的社会还是别人的社会的问题，因为他是超脱的，是在较高的境界看一切社会、看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这点上我和 Leach 似乎又是有分歧的。

问：“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原则又是如何从研究者之间、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推广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并得到升华的呢？

答：在和瑶族人民一起生活中我才亲身体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境界升华。“各美其美”是指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

价值标准，各自有一套自己认为是美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别的民族看来不一定美，甚至会觉得丑恶、不堪入目。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民族接触的初期还常常发生强迫别的民族改变他们原有的价值标准来迁就自己的情形。民族间能相互尊重对方的价值标准还不是太久远的事，能容忍“各美其美”是一大进步。只有在民族间平等地往来频繁之后，人们才开始发现别的民族觉得美的东西自己也觉得美。这就是“美人之美”。这是高一级的境界，是超越了自己生活方式之后才能得到的境界。

这种境界的升华极其重要。由各种文化塑造出来具有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人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小小环球之上了，他们怎样才能和平共处已经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了。如果人类学的训练确是可以引导人“美人之美”，那将大益于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美人之美”境界再升华一步就是“美美与共”。不仅能容忍不同价值标准的存在，进而能赞赏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离建立共同的价值就不远了。“美美与共”是不同标准融合的结果，那不就达到了我们古代人所向往的“天下大同”了么？从这个角度去看我和Edmund的缺席对话，其意义就不仅限于我们少数不同国籍的人类学学者的共同兴趣，而是还可以联系到今后世界人类怎样进入21世纪的问题。

这就是我概括的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也许就是人类学的道路。

（该稿经被访者本人审阅）

中根千枝：民族和文化差异并非冲突的根源

问：两性之间的文化沟通也应该是人类学的主题之一，作为

女性人类学家，两性文化和妇女问题在您的学术研究中居于什么地位？如果您发表关于妇女问题的看法，您是否意识到由于您是女性？

答：我研究过东亚家庭制度，但我不关注妇女问题。有的女性人类学家对此研究较多，如 Margaret Mead (M. 米德)。但这类问题与是否是女性人类学家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探讨妇女问题，我不会从我的性别出发。有人会有相反的看法，但我不认真对待这种看法。

问：近来在关于妇女运动的人类学研究中有这样一种说法：人们长期被灌输一种男性偏见的社会观。您认为这种观点正确吗？您的 Japanese Society (《日本社会》，1970) 似乎也受到过类似的批评。

答：我反对笼统地那样说。就我对日本社会的研究而言，我是在力图发现社会核心的基本制度。由于大多数妇女是家庭主妇，很少出现在正式组织的场所，所以在我的框架里忽略掉了妇女，但这的确不是我有意为之的。准确点说，在组织中工作的妇女都能被纳入基本制度中去，凡是有妇女参加的组织都是这样的。有趣的是，Fred Eggan (F. 伊根) 读完 Japanese Society 一书的手稿，却作出了这样的评论：“你能够写出这样一本饶有趣味的书，也许由于你是一位女性，因而更能客观地看待男人的工作。”

在工作组织里，妇女与男人一样也被纳入等级制度中，确切地说，order (秩序) 是比性别差异更重要的。在日本社会里，人们更关心秩序，你比我晚一年被聘任为大学教授与你是男性或是女性没有关系。在芝加哥，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无异性同伴参加的大学教授集会，女教授被拒之门外，这很令我吃惊，类似的事情

在日本是不会发生的。我不知道现在那里是否还有这样的集会。

问：那么是否可以说日本社会制度对妇女是更公正的？

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一旦你获得与男性相当的地位，你们之间就没有什么不同，在一个组织中你与你的男同事都是同样的组织成员。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两性之间划了一道清晰的界限，而在日本和东南亚，这条界线很模糊，使妇女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更自由。

问：东亚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大都是接受西方人类学训练而后进行异族文化或本土文化研究的。他们在方法论上有什么难题吗？

答：东亚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有着共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即广义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汉文化，就此而言，东亚与西方的距离比其他地区与西方的距离更远。作为人类学研究的田野，东亚社会从根本上不同于人类学家通常所说的田野。事实上，东亚学生常常要与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流派做艰苦的斗争，因为随意地把某些概念和方法运用于本土研究常常会产生一些蹩脚的结论，反映不了所研究的社会深度和广度；而如果不接受西方社会科学学科训练，又容易陷入自己传统学术术语的泥淖，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难以理解描述或空想，并由此给人们制造对传统研究的障碍。这就有一个如何解释东亚人类学家的发现以使其能与西方社会科学接轨的问题。总之，受过西方训练的东亚人类学家面临着两难境地，特别是当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必须逐步形成自己的方法论。

问：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不同民族（种族）和文化之间的冲突频繁发生，人类学对此如何解释，有何作为？

答：仅就民族和文化而言，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接触不会

造成真正的冲突和对抗，因为民族和文化不是冲突的根源，只有发生领土或资源争端，或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才会有真正的冲突。如果没有经济的、政治的利害关系，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接触交往可能会很好。我们经常说黑人和白人、印度教教徒和伊斯兰教教徒、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发生着种种冲突，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民族、种族、语言、宗教信仰不同，而是因为他们当中出现了政治野心家，这些政治野心家为了特定的目的，利用民族和文化差异，强调民族意识，煽动歧视和仇恨，进而酿成冲突。

当然，由于各种差异，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难免发生误解、偏见或表面的冲突，但只要不将其隔离开来，而让他们长期接触，是会结成较好的关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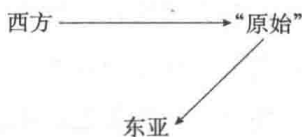
冲突一旦发生，人类学家只能解释其原因；至于解决冲突，那是政治家的事。

（该稿经被访者本人审阅）

李亦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贯通

问：与西方文化人类学研究相比，东亚文化人类学研究有什么特点？

答：人类学研究是从西方开始的，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西方文化人类学者研究的对象是殖民地、“原始”部落或“落后”民族，并形成研究异族文化的传统。直到现在，他们大多主张人类学者要研究异族文化。东亚文化人类学者大多先接受西方文化熏染，接受西方文化人类学教育，然后研究本地区的少数民族，而后转向本民族文化的研究。这一特点，我用一个图来表示：



可见，西方文化人类学研究是二维的，只有一个文化参照系；而东亚文化人类学研究则是三维的，不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还是研究本民族文化，都有两个文化参照系。应该说东亚文化人类学者是占了便宜的，他们的研究模式使其更少带价值偏见。对西方而言，东亚是殖民地，东亚文化人类学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这样，当他们去研究少数民族时，就会更自觉地放弃自己的文化背景，不带“殖民意识”；而当他们研究本民族文化时，也不会完全用西方标准作参照，当然也不会完全用少数民族文化作参照，而是同时参照两种文化系统，更多地从本民族文化自身特点出发，去发现本民族文化的独特的“文法”或“逻辑”。

拿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来说，东亚人认为，人是可以达到完美境界的，所以人可以成神，如孔子，如关公，这在西方人是难以理解的，他们的神是完美的，而人是不完美的，人生而有罪，所以不可能成神。西方关于泛灵论、多神教、一神教的进化模式在东亚并不完全适用。他们经常问我们：“你信什么教？”这个问法本身就不妥当，中国大多数汉族老百姓既信儒教，又信道教，还信佛教，这对于他们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的宗教是相互排斥的，只能信仰一种宗教，而不似东亚各种宗教可以相互包容。东亚文化人类学家通过对民间宗教的研究，就可以发现上述东亚宗教的特点，以修正西方宗教观，甚至进而修正西方文明。

问：为什么东亚文化人类学家大多在本土做田野工作？

答：一方面，东亚地区民族众多，尤其是中国，多达 56 个民族，每个民族地区都是很好的人类学者田野工作的场所，所以